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下的“工程共同体”

田凯今, 谢咏梅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哈尔滨 150001)

摘要: 目前工程社会学在我国受到广泛关注,“工程共同体”作为工程社会学的共识概念也得到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本文针对“工程共同体”概念边界模糊、成员异质和“岗位人”局限等有待商榷之处,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进行反思性审视,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会”态度,“非人存在”态度和“行动者”态度与工程活动的内在契合。基于传统的社会学分层理论,只能把利益视为“工程共同体”唯一的共同目标,伦理前置的优先性地位难以保障。但工程作为一种人的存在方式,伦理之维本应是其内在的向度,是工程的前件。本文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两种工程伦理规范的开显,当开出伦理之维的本真工程出场,真正的共同体才有可能成立。

关键词: 工程共同体; 行动者网络理论; 拟客体; 伦理规范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969(2018)03-0228-09

引言

目前,我国工程社会学研究方兴未艾,但是就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范式等基本问题,学界依然莫衷一是。由于系统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达成共识的概念范畴数量稀少,那么对于共识概念的分析就尤为重要。如果不能对已有的核心概念做出细致准确的辨析,我们就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得到工程社会学的有效进路。

在学界的共识概念中,李伯聪教授从与“科学共同体”的类比出发得到的“工程共同体”概念是国内最早提出的关于工程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思想体系^[1]。李伯聪教授认为,工程共同体不但是整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共同体,而且是支撑社会存在和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共同体。工程共同体是由工程师、工人、投资者、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异质”成员的共同体^{[2]1-9}。

李伯聪教授从2005年到2010年发表了五篇有关“工程共同体”的专题论文,并在2010年主持出版了《工程社会学导论:工程共同体研究》专著,书中对“工程共同体”的各类成员、“工程共同体”的两种类型以及所谓“工程共同体嵌入社会”都做了精到的分析。在2005年的《工程共同体中的工人——“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一》(下称研究一)中,李伯聪教授提出了“工程共同体”的概念并着重分析了共同体的一类成员——工人。提出工人是工程共同体的一个绝不可少的基本组成部分^{[3]64-69}。在2006年的《关于工程师的几个问题——“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二》(下称研究二)中,李伯聪教授着重讨论了共同体的另一类成员——工程师的职业性质和特点,并指出工程师面临的“边缘人”困境^{[4]45-51}。2008年的《工程共同体研究和工程社会学的开拓——“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三》(下称研究三)中,李伯聪教授对工程共同体做了“工

程职业共同体”和“工程活动共同体”两种类型的区分,并分析了维系“工程活动共同体”的四种纽带^{[5]63-68}。这是第一次对于工程共同体的内部体系做出了分析。如果说“工程共同体”这一概念为我们打开工程“黑箱”提供了钥匙,那么这四条纽带则是为我们理解“工程共同体”这一钥匙提供了可能。2010年的《工程共同体的形成、动态变化和解体——工程共同体研究之四》(下称研究四)从生命周期的角度考察了工程活动共同体的四个阶段以及“成员网络”的动态变化^{[6]40-44}。最后一篇《工程共同体中的“岗位”和“岗位人”——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五》(下称研究五)分析了“本位人”在工程共同体中变格为“岗位人”的问题^{[7]57-62}。

上述五篇文章及随后的专著极大地丰富了“工程共同体”的内涵,为工程社会学及工程哲学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贵方向,但笔者认为,“工程共同体”概念仍有其必须面对的问题。首先是共同体边界不清,在工程活动的作用机制中难以对工程共同体做出准确的定位;其次是成员异质,“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是同质的,而“工程共同体”则几乎囊括了与工程相关的所有出场人士。最后就是工程共同体中的“岗位人”概念,“岗位人”的“出场”是否真的造成了“本位人”的退场?笔者认为,反映在这三个问题背后的深层问题则是在目前的“工程共同体”概念中,伦理之维依然没有得以揭示,处于遮蔽状态。伦理之维的引入有赖于我们如何看待工程本身以及工程目的,伦理内涵即“工程至善”的绝对命令本应作为工程的前置,引领人的造物活动。在这里又涉及了工程“应然”层面与“实然”层面的分析。本文试图用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 ANT)来反思性审视“工程共同体”概念。引入拉图尔“拟客体”概念,在工程本体论层面阐释何为工程,进而推出“工程共同体”概念所缺失的两类规范。

1 “工程共同体”概念面对的问题

1.1 边界模糊

在“研究一”中可以看到工程共同体的组成包括多类成员:资本家(投资者)、企业家(工程指挥人员)、管理者、设计师、工程师、会计师、工人等^{[3]65}。可以看到不同成员一些从职业角度进行划分,一些从成员在工程活动中的功能划分。在“定义一”中,成员内部就存在重叠问题。

在“研究二”中李伯聪教授认为工程共同体主要由四类人员——工人、工程师、投资人(在特定条件下是“资本家”)和管理者——构成^{[4]45}。更新后的定义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成员内部的重叠问题,各组成成员有明确的岗位限制。但若要一项工程成立,仅仅以上四类社会成员就可达成吗?比如一项PX工程的兴建一定也需要工程所在地公众的知情。“定义二”面临的问题是划界过小。

在“研究三”中,李伯聪教授指出工程共同体是由工程师、工人、投资者、管理者、其他利益相关者等多种不同类型的成员所组成的^{[5]65}。由于增加了利益相关者这一集体,“定义三”虽解决了“定义二”中划界过小问题,同时工程共同体的组成成分也变得无比庞大,甚至难以区分其与社会成员的关系。“利益相关者”中“相关”的语词含义消解了“工程共同体”中“共同”之义,“工程共同体”概念退化为“工程相关体”。

由此可见,在李伯聪教授关于“工程共同体”概念的上述研究过程中,工程共同体成员“时常变动、边缘模糊、组成复杂^{[5]66}”,如果最后的“工程共同体”近乎“工程相关体”,“工程共同体”组成的划界又从何谈起?

1.2 成员异质

“工程共同体”的概念是从与“科学共同体”的概念比较中得出的,而笔者认为这种比较可能

也有待商榷。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后记中,库恩本人也承认,“范式”一词的出现方式实质上是循环的。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8]。科学共同体由科学工作者组成,共同体中的科学工作者接受了大体相同的学术训练,无论共同体内部还是外部对于其都具有集体认同,而这种认同在“工程共同体”上则不能成立。工程共同体各成员除了被“工程”及其带来的利益相连接外,似乎没有其他相似之处。甚至,由于工程实施共同体内部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而导致工程活动共同体的“非正常解体”,于是工程活动也就不得不“非正常终结”了^{[6]44}。这在“工程共同体”中并不少见,而在科学共同体中极其罕见,科学共同体的解体往往由于纲领的乏力或领袖的淡出。

1.3 “岗位人”局限

李伯聪教授在《研究五》中提出“本位人”与“岗位人”的区分,指出作为自在、自为个体的个人称为“本位人”,把在共同体中占据一定“岗位”并发挥相应功能的个体称为“岗位人”^{[7]57}。但是这种“本位人”与“岗位人”的简单二元区分,忽略了作为人的连续性,将“岗位人”这一“本位人”的变位抽象出来并提高到与“本位人”相当的地位,可能也割裂了“本位人”与“岗位人”的统一。同一“岗位”不同“本位人”的“在场”,对于一项具体工程来说当然同样存在差异,李伯聪教授着眼于“在场”工程,从动态的视角来分析同一“本位人”在工程共同体中与“岗位人”的相互转化,却忽视了“缺席”工程视角下,不同“本位人”处于同一“岗位”形成的同一“岗位人”内的差异。

“岗位人”的“出场”其实并没有造成“本位人”的完全“退场”,在“工程共同体”中无论是“岗位人”还是“作为社会实在的集体本位”都没有也不应当造成“本位人”的“缺席”。

2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核心概念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是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巴黎学派的代表人物,行动者网络理论虽然不是由他最早提出,却在拉图尔这里得到发扬光大,他提出的实验室人类学研究方法与行动者网络理论等重要思想在社会学界与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

拉图尔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对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吉耶曼实验室进行了人类学式的观察,与英国社会学家斯蒂夫·伍尔加(Steve Woolgar)合著了《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这是拉图尔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在这本书中虽然没有具体的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但是已经是按照其理论思想进行研究。之后,拉图尔在《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导论》(Latour, 2006)中第一次系统完整地三个核心概念:行动者(agency)、转译者(mediator)、网络(network)来展现行动者网络理论如何重组社会。其中,行动者一词,在拉图尔这里有更广泛的内涵,它不仅指行为人(actor),还包括观念、技术、生物等许多非人的物体(object),任何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事物状态的东西都可以被称为“行动者”^{[9]222}。转译者可视为一种对待行动者的态度,认为其在行动者网络中可根据自身需要去改变其本应表达的元素。网络是一系列行动的网络(a string of actions),行动者置身其中借以转译。

建立在这三个核心概念之上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就是异质行动者建立网络、发展网络以解决特定问题的过程。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10]。这里的行动者既可是人也可非人力量。同时行动者作为一种转译者会改变(transformation)、转译(translation)、扭曲(distort)和修改(modify)他们本应表达的意义或元素^{[9]223}。

在某种意义上说,行动者网络理论揭示了科学之内在的工程和社会本质,以此来理解工程活

动或许会更为适当。针对“工程共同体”概念的乏力之处,笔者试图以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待“社会”的态度、对待“非人存在”的态度以及对待“行动者”的态度分别解决其边界模糊,成员异质和“岗位人”局限三个问题。

3 “社会”、“非人存在”、“行动者”与“工程共同体”

3.1 对“社会”的态度

社会学中存在着两种范式的对立,即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social)和联结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9][220]}。在前者看来,社会中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问题,可以从社会背景中寻找根源并加以解决,而在后者看来,并不存在作为背景的社会,所谓“社会”只是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拉图尔无疑是后者的代表人物。

“工程共同体”概念的边界之所以模糊不清,正是在于对工程的考察始终没有摆脱第一种范式,工程一直是作为社会背景之下的工程为人们所研究。所谓工程共同体成员的“时常变动、边缘模糊、组成复杂”都在提示着人们在划界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解释可能。而拉图尔提倡“联结的社会学”这一范式是为了消除科学的研究领域——自然与社会的对立,认为这种从社会背景出发来解释科学是“以社会解释社会”。笔者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社会”的态度可以说是反向消解了边界不清的问题。从联结的观点来看,本就不存在以社会为背景的某一领域与其他领域的边界,自然也就无所谓边界不清的问题。拉图尔所关切的是科学领域,同样,工程中也含有社会成分,我们如果固守“社会的社会学”观点,只是通过社会背景来考察工程,考察的结果只能是强加边界,将社会的工程成分与工程的社会背景人为割裂。只有不再区分工程的“与境”(context)和“内容”(content),工程处于不断发生、变化与消亡的联结本质才能得以揭示。

3.2 对“非人存在”的态度

对于“工程共同体”概念中成员异质的问题,田鹏与陈绍军所著的《从“工程共同体”看“科学共同体”》从与科学共同体的比较中,对工程共同体概念质疑,本文此节将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非人存在”的态度进行反思性审视。

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社会与物质都是网络的产物,要同时描述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并用同样的关系架构来处理他们^[11]。之所以“工程共同体”各成员之间难以获得有效的整合,正是因为忽略了“物”而只是简单地使用不同身份的“人”来作为行动者。在与“科学共同体”类比而得到的“工程共同体”框架下,成员异质的共同体得不到逻辑一致的合法性,因为借以类比的“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是同质的,同质与异质的区分也是“工程共同体”概念与“科学共同体”概念的重大差异。这样一种异质构成使得寻求“工程共同体”之共同陷入困境,只能运用分层理论去分析单一行动者内部共同,回避了“科学共同体成员同质,工程共同体成员异质”这一类比的合法性问题。笔者认为,这种成员异质的逻辑合法性在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下可以得到。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非人存在或力量可通过代言人(spokesman)来表达,而代言人背后是人类行动者(actor)或非人行动者(actant)无关紧要。拉图尔通过代言人,化解了人与物的不可通约性。传统的工程哲学研究只关注共同体各成员的意向性,而忽视了“技术的意向性结构”中“非人存在”同样不可或缺。可能一些学者对于“技术意向性”这一概念有所怀疑,但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依然拘泥于胡塞尔式对意向性最初的理解,即认为意向性是“自我在其中作为自我生存之意识方式的基本特性”或是“我思与我思对象的张力关系”的话,认为“非人存在”不存在意向性问题似乎可以理解。但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后现象学这一视野的话,可以看到在“人——技

术——世界”关系中,人与技术是相互构成的。如果没有人,意向确实无从谈起,但如果没有“物”,在解释学关系与它异关系中,人的意向性成了无对象的思;在具身关系中,意向性丧失了借以延伸的道路即结构;在背景关系,意向性有别于对象性的那种“指向”意味赖以生存的开放空间也随之消失了。借助对“非人存在”的意向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工程中“非人存在”的意向性一方面是人意向性的延伸,一方面也是与人的意向性对称相互构成的。这样,一种更为广阔的工程共同体成员的异质性在我们面前得以彰显,这里的异质性不仅仅局限于人类成员来自不同社会领域,而是包括了更广泛的“非人存在”。

可能会有这样一种疑问,如果真如上文所述,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我们从一种温和的异质走向了极端的异质性,何以说这样一种理论解决了成员异质的问题?实则不然,当我们暂时搁置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路径依赖,正视“非人存在”的意向性,并包容地将其纳入“工程共同体”的成员之中时,其实表面的成员异质已不能遮掩,一种真正的“共同”已借此现身——工程伦理。不同于似乎有些冰冷的工程利益将共同体成员聚集,这种“共同”更为柔和而持久,而这才是解决工程问题的希望所在。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而只有拒绝的东西才能给出存在于可能性中的东西,黑暗拒绝可视性,而它也同样保持视觉:在黑暗中我们看见了众星。”

3.3 对“行动者”的态度

对于“本位人”与“岗位人”的区分,本质上是一种功能主义观点,即把共同体成员视为处于特定岗位上完成特定功能的人。行动者如果只是完成特定岗位的功能那就与“黑箱”无异,行动者如果只是毫无自身意见地进行转运,那么工程中出现的诸如管理问题、预算问题就难以得到解释。而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行动者”实际上是作为“转译者”出现。“转译”表示的意思是,

它是由事实建构者给出的、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interests)和他们所吸收的人的兴趣的解释^[12]。实际工程中正是由于行动者不断地转译——改变、修改、扭曲他们本应转运的要素,才造成了实际工程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

“岗位人”出场时“本位人”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转译者将自身诉求在行动中转运。更进一步,行动者网络理论这种不同于功能主义的态度也保证了工程共同体中各类成员在社会秩序下并不丧失主体性。

4 两类工程伦理规范的揭示

通过第一部分对“工程共同体”概念面对的问题以及第三部分行动者网络理论三种态度的分析,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即是否还要坚持通过“共同体”概念来分析工程活动,笔者认为答案至少是可讨论的。而且“工程共同体”概念来自于与“科学共同体”的类比,但是这两者却存有性质与组成上的诸多不同,即使单从词语起源而不是概念工具的适用性来看答案也是可讨论的。

笔者认为,“工程共同体”与“科学共同体”之不同绝不仅仅是成员异质与成员同质的表层差异,而在于前者的结构系统之质是金钱,后者的结构系统之质是知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其制度性目标是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并且在默顿看来,学术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整体结构将实现最终目标^[13]。因此科学研究人员以知识生产为天职,知识生产具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而工程共同体的各个组成成员更重视在工程的建造中或建成后获取报酬或称利益。金钱来源不一,在流动中具有非共享的排他性,不能够实现科学共同体“为知识而知识”的那种明确、持久而统一的召唤。这种系统质的不同也导致了科学研究与工程活动权力结构的差异。表面来看,科学研究的结构性体制同工程活动一致,同样为科层制金字塔结构,同样有类似“项目经理——总工——技术员——

劳工队”的“实验室教授——副教授——博士——硕士”的权力结构。但二者的弹性差异巨大。面对新知,学生与教授具有平等地位,并不能认为教授一定比学生先一步获取新知,这是科学自由、开放、共享精神的体现。而在传统“工程共同体”也就是“利益共同体”的视角下,在金钱逐级向下流动的工程活动中,由于共同体成员只能依靠金字塔上一层获取利益,两级具有“天然的”不平等。这种“天然的”不平等在工程中不仅仅存在于如上所述的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总工——技术员——劳工队”这一微型科层金字塔中,而是普遍存在于“工程共同体”即利益共同体的全成员中。由于“工程共同体”成员对利益的唯一诉求,建设单位或出资方永远处于对以施工单位为代表的工程弱势成员的优势地位上。在《工程社会学导论:工程共同体研究》中,李伯聪教授将工程共同体比喻为一支军队,其中工人就是士兵,管理者相当于各级司令员,工程师是各级参谋,投资人则相当于后勤部长^[14]。这里同样也可看到社会学分层理论的影响。但作为异质性的“共同体”,恰当的分析工具应当是“行动者网络”,而非分层理论。“工程共同体”实际上是一个网络结构,而对这一异质网络结构的动力学分析需要关照作为“共同体”的体制化目标而展开。在科学中,体制目标有赖于学术规范与道德规范的整体结构,而在工程活动中,工程何以可能?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从始至终我们一直忽视了工程的前件——伦理,从而简单地理解工程单纯是一种造物活动。工程作为一种人类的存在方式,伦理之维本应是其内在的向度,工程伦理隐而不现的同时,本真的工程也一同随之隐退。伦理恰恰是“工程共同体”所最应具有“共同”纽带。但只有在新的语境基础中,工程伦理的澄明才有可能。笔者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取代分层理论充当这一语境基础。之前我们始终着眼于工程活动规范,而忽视了工程伦理规范。如果将这两

种规范置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来解读,笔者认为具体的工程活动规范可以近似视为单一活动者内部的行为规范,而工程伦理规范是行动者之间的工程规范。下面本文同样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社会”、“非人存在”与“行动者”的三种态度加以分析。

首先,从对“社会”的态度来看,拉图尔对称地取消了自然与社会的超越性,提出“拟客体”概念。笔者认为这一概念的引入有助于我们脱离传统的社会视角,以中立态度重新认识何为工程。如上文所述,拉图尔提倡“联结的社会学”,反对自然与社会间存在的对立。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Latour, 1993)中更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我们实际研究的对象既不是自然也不是社会,而是位于这自然与社会两极之间的“拟客体”(quasi-object)。拉图尔认为“拟客体”比自然的部分更具有社会性,更具有集体性,但它们绝不是一个成熟社会的任意容器。另一方面,它们更真实、更非人类、更客观,而不是那些不为人知的社会所需要投射的那些无形的屏幕^[15]。这种“拟客体”可被视为“自然”与“社会”的杂交物。正是由于人们研究的视角始终聚焦自然与社会这两极,忽视了“拟客体”,拉图尔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从未现代过。笔者认为“拟客体”可以用线与面的比喻来阐释:在以往的理解中,“拟客体”之线被认为是自然的界面与社会的界面相交而成,但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野下,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维的线增加某个维度的变化范围后,维度上升一维成为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原纯粹自然和纯粹社会的努力可以终止了,没有纯粹的自然与社会,研究对象始终是“拟客体”。“拟客体”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本质上是对自然实在论与社会建构论的超越。这种取消自然与社会的超越性,否认主客二分,成立一个“中间王国”的看似有些极端的理论,其实对于唤起“工程共同体”的伦理之维是大有裨益的。这同样可以被

看作是一次“哥白尼革命”，在这种视域下，我们不再从自然与社会的两极来看待工程或科学或其他杂交物，而是从这一“中间王国”出发，向我们曾经的出发点投以反思性凝望。汪志明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工程哲学意蕴——布鲁诺·拉图尔思想研究》中指出：“‘拟客体’实质是一种混合本体论。这种混合本体告诉我们，工程完形包含自然和社会因素，工程行动者网络是解释人工自然和社会的起始点^[16]。”从工程哲学的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当社会与自然的对立不再作为预设时，工程的完形也就不再成为拷问自然交出全部秘密的社会力量的奇观，而是自然与社会在合理性下的“杂交物”，只有追踪这种“拟客体”，才能把握工程的本质，重新构建一种工程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民主。这种民主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民主，而更强调人与非人。不仅是还原工程中的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而是从系统论的高度重构工程。从“拟客体”的观点出发，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到下文论说的人与“非人存在”之间的工程伦理规范。

其次，从对“非人存在”的态度来分析，第一类规范即人与“非人存在”之间的工程伦理规范得以彰显。如果说在科学研究中拉图尔强调“非人存在”遭受非议可以理解，那么在“工程共同体”中强调“非人存在”在建构工程中的重要作用似乎就是工程活动的应有之义了。工程的行动者网络本身就是异质力量的多场耦合。具体反映在工程活动的各个阶段，“非人存在”可以是建筑设计师共同商讨后画出的图纸，可以是施工人员用于测量的全站仪，甚至可以是销售人员的宣传手册。当然更包括身处“非人存在”之中又为一切“非人存在”起到奠基性作用的自然。工程的建构实质上就是行动者意义上的人类行动者与“非人存在”相互耦合的实现过程。这样的实现内同样还存在着一种在共同体视角下往往被遮蔽的因素——“非人存在”。“非人存在”天然的“无

声”让它无法找到自己的代言者，正如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一种“工程共同体”的定义中也无法找到“非人存在”的位置。“工程共同体”对共同体内部成员保有其能够享有利益的权利，而未被纳入“工程共同体”的“非人存在”的利益却始终缺席。但“非人存在”天然的“无声”并不绝对，只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彰显。“非人存在”具有自我遮蔽的特点，失效时就总是隐身于工程中。只有当“非人存在”并不按照“工程共同体”意愿显露自身之时，共同体成员才意识到这位缺失的成员。而此时的生态问题即是“非人存在”的代言者。从“拟客体”的视角出发，社会力量在自然面前并不具有天然的优越性，而对“非人存在”的认可这样一种平等观念在以往基于分层理论对“工程共同体”的解读中是不能够做到的。笔者认为，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非人存在”的态度才有可能及早认识到“非人存在”在工程活动中的独特性与奠基性作用，才能实现工程与伦理的合一，在工程实践中也才能真正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最后，从对“行动者”的态度来分析，第二类规范即人与人之间的工程伦理规范得以开显。毋庸置疑，在工程活动的动态变化中，无论是社会工程规划中政府的主体地位问题，还是工程施工中凸显出的弱势群体遭受暴力拆迁问题的解决，首先都有赖于我们对于工程主体的认识。单一主体性的扩张是否真的有利于工程建设是工程社会学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这一点，行动者网络理论可以说提供了可贵的主体间性的视角。行动者不再是占位符或是又一黑箱，而是有着自身诉求的转译者。只有当工程实践真正认识到行动者的“转译”，在工程伦理领域实现从康德式的独语论向商谈实践的转向，从绝对命令伦理向商谈伦理的转向才有可能^[17]。在商谈伦理的语境基础上，我们应该做到各方行动者享有平等表达意见的自由，行动者不会因自身对工程贡献的不同

而有丧失话语权的风险。在更加广阔的行动者网络中,宣告共识存在的工程的完形才称得上是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统一。

虽然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来分析,从工程伦理规范中辨析出第一类规范即人与“非人存在”之间的工程伦理规范与第二类即人与人之间的工程伦理规范意义不大,两者在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内是同一的。但在工程实践活动中做出这一分辨仍是必要的,更明确的指出有助于我们明确工程伦理规范中的突出矛盾。首先,从成员组成来看,前者局限于人类行动者,诸多人类行动者转译自身兴趣形成网络,定义工程合理性。后者则是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的结合。其次,这种成员组成上的组成也造成了两者的显隐差异。由于人类行动者本身即是自身代言人,可以天然发声,我们称第一类伦理规范是显性的。但由于非人类行动者天然地缺乏代言人,所以第二类伦理规范是隐性的。由于这一隐性,即使该伦理规范长期处于失范状态,人类行动者也难以觉察。

这两类伦理规范有所区别之同时也绝不分立,依然有紧密联系。首先,两类规范并不是分别设立而来,而是存在相互制约。在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中,由于两类规范是同一的,难以阐明这种制约关系。如果回到传统的自然——社会框架进行分析,那么可以认为这种制约保持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张力平衡。其次,实质上不可或缺的两类共同编织了工程的伦理之网,这一网络渗透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之中,失去两者之一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会导致工程伦理规范整体的崩溃。当然,这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5 结论

首先,本文通过对“工程共同体”边界模糊、成员异质和“岗位人”局限等三处问题的分析,认为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引入工程哲学这一尝试,可以分别从对“社会”的态度、对“非人存在”的态度和对“行动者”的态度为“工程共同体”

概念提供反思性审视。

其次,本文认为工程作为一种人的存在方式,伦理之维本应是其内在的向度,是工程的前件。而基于传统的社会学分层理论,只能把利益视为“工程共同体”唯一的共同,伦理前置的优先性地位难以保障。

最后,本文认为行动者网络理论有助于反思工程伦理之维的解蔽,推出工程活动的两类伦理规范。从对“社会”的态度出发,通过“拟客体”概念的引入,超越社会与自然的二分,重新审视工程的本体论地位。基于“拟客体”,从对“非人存在”的态度出发,可以公正地认识“非人存在”的奠基性作用。从而呼吁第一类工程伦理规范即人与“非人存在”之间的规范。从对“行动者”的态度出发,工程实践不应仅是单一主体性扩张的体现,而是在相关行动者全部出场的条件下达成交往共识,以工程的完形宣告共识存在。从而呼吁第二类工程伦理规范即人与人之间的规范。笔者认为只有当开出伦理之维的本真工程出场,真正的“工程共同体”才有可能存在。

过去二十年间,我国工程哲学与工程社会学在李伯聪教授的带领下立足本土取得了长足进展,可以说与西方工程哲学双峰并峙。但在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发生“实践转向”的当下,理论思维与实践思维走向融合,我国工程社会学也理应从实际工程之外寻找自身的理论养分。立足本土,吸收西方的学术思想资源依然有其时代意义。关于工程社会学的探索仍在继续。

参考文献

- [1] 田 鹏,陈绍军.从“科学共同体”看“工程共同体”——与李伯聪教授商榷[J].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16(01):55-62.
- [2] 李伯聪.工程社会学的开拓与兴起[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1-9.
- [3] 李伯聪.工程共同体中的工人——“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一[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02).
- [4] 李伯聪.关于工程师的几个问题——“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二[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02).

- [5] 李伯聪. 工程共同体研究和工程社会学的开拓——“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三[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8(01).
- [6] 李伯聪. 工程活动共同体的形成、动态变化和解体——“工程共同体”研究之四[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0(01).
- [7] 李伯聪, 海蒂. 工程共同体中的“岗位”和“岗位人”——工程共同体研究之五[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0(03).
- [8] 托马斯·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M]. 金吾伦, 胡新和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147-148.
- [9] 吴莹, 卢雨露, 陈家建, 等. 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J]. 社会学研究, 2008(02).
- [10] 刘济亮. 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研究[D].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6: 40.
- [11] 刘文旋. 从知识的建构到事实的建构——对布鲁诺·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种考察[J]. 哲学研究, 2017(05): 123.
- [12] 拉图尔. 科学在行动: 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M]. 刘文旋, 郑开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184.
- [13] 默顿. 科学社会学[M]. 鲁旭东, 林聚任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365.
- [14] 李伯聪等. 工程社会学导论: 工程共同体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7.
- [15] Latour B.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M]. Harlow, England: Longman, 1993: 55.
- [16] 汪志明.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工程哲学意蕴——布鲁诺·拉图尔思想研究[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1(12): 58.
- [17] 曹玉涛.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工程的伦理之维[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9(09): 57.

“Engineering Community” from Actor-Network-Theory Respective

Tian Kaijin, Xie Yongme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engineering sociology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our country, and the “engineering community” as a consensus concept of engineering sociology has also been enthusiastically discussed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engineering community” with blurred conceptual boundaries, heterogeneity of members, and limitations of “position-persons”. It uses the Actor-Network-Theory to conduct a reflective review and points out the attitudes of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engineering activities there is an inherent fit.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sociological stratification, only interest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only common “engineering community”, and the priority of ethical pre-position cannot be guaranteed. But as a kind of human existence, the dimension of ethics should be its inherent dimension and the front part of the project.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Actor-Network-Theory is conducive to the disclosing of the two engineering ethical codes. When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the original project are played, the real community may be established.

Keywords: engineering community; Actor-Network-Theory; quasi-object; ethics codes